支教骗局被查,受骗者怎么不喊冤

评论员观察

无论是大学生组织实践,还是农村孩子的暑期托管,都是需要耗费成本的,交给教育部门或正规机构来办的话,也少不了各处筹钱。也许是怕麻烦,也许是受资金限制,有权或合法的机构没有发现“痛点”,难免就会有商业力量见缝插针了。

正值暑期,“精明”的商人自然忘不了从学生身上“捞金”。陕西省汉中市教育部门最近就查处了一起以爱心支教为名的骗局。一家教育咨询企业,从大学里招募了几百名志愿者,在汉中市西乡县的一处村落开起了收费辅导班。

“活动组织者”算盘打得很响:大学生有暑期实践的需求,农村的家长担心孩子没人管,能将两者结合并从中赚取“差价”的话,不失为一门“好”生意。如果不是当地村委会的举报,这门生意说不定真做成了。可事到如今,辅导班开不成,多数大学生志愿者只能无功而返,村里的家长得为孩子“脱管”着急,涉事企业想必也要付出代价,预想中的“三赢”变成了现实中的“三输”。

既然说“三输”,不妨就看看输掉的三方都是怎样的反应。其实在教育部门接到举报开展查处之前,三方相处得还算和谐。来“支教”的学生对“报销路费、食宿费,招生补贴350元”的政策,是比较满意的;家长对每节课6-8元的收费标准,也是愿意接受的;组织活动的涉事企业,那就更不用说了。

支教团或者说辅导班被查处,更像是你情我愿的“鸳鸯”遭遇了“棒打”。通常而言,一场骗局被戳穿之后,肯定会有“受骗者”痛斥骗子、伸张权利,而在这起事件中,作为直接“受害者”的孩子家长和大学生志愿者却很反常,极少指责这家借支教名义牟利的企业。教育部门明明是依法办事,企业明明没有合法的办学手续,难道企业还有理了?

或许孩子家长和大学生的反应已经给出了答案。虽然名义上不合法,但收费的辅导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精明”商人的盈利点,恰恰对准了某些群体的“痛点”。无论是大学生组织实践,还是农村孩子的暑期托管,都是需要耗费成本的,交给教育部门或正规机构来办的话,也少不了各处筹钱。也许是怕麻烦,也许是受资金限制,有权或合法的机构没有发现“痛点”,难免就会有商业力量见缝插针了。

所以说,尽管不合法,但涉事企业找到的这条“致富”路子,却是有合理性的,正是市场的力量调动了资源,“自动”地寻找到了需求所在。如果辅导班没有被及时查处,如果涉事企业的“支教业务”开展下去,说不定假以时日还会形成一种可以推广的商业模式。等到“精明”的商人做大之后,当人们听到他讲述如何捞到第一桶金,说不定当初的违法反而成了“不拘一格”的象征。

可惜没有如果,一场骗局就这样被终结了,还不等人们看到这场骗局的危害,甚至也说不清这场骗局继续下去的话到底有什么危害。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合法”的反思。在暑期教育托管需求越发旺盛、合法机构无法创造足够服务的当下,现有的政策门槛是不是太高了?

如果把视线从农村扩展到城市,类似“收费支教团”的机构可谓遍地开花。那些名为“工作室”的才艺辅导班,那些打着“小饭桌”旗号的托管班,那些经营项目注册为“教育咨询”的培训班,又有多少合法的呢?有多少创业者一开始就能拿出动辄几万块“保证风险”呢?有志于教育培训工作的人有多少考出了教师资格证呢?如果没有这些不合法的机构,又有多少家长孩子的需求找不到出口呢?

反正就目前来看,西乡县那个村子里的村民又该犯愁了,几乎每年暑假都会有农村孩子因为“无人监护”付出血的代价。

公交站被“攻陷”,别都怪共享单车

一家之言

□李清

近期,不少市民拨打报社热线反映,厦门的不少公交车站被共享单车“攻陷”,这些共享单车“霸占”人行道,堵住BRT出入口。记者在某公交站附近看到,近百米长的人行道停满了共享单车,人行道变身车行道,市民和游客被迫在马路上行走。某城市广场公交站附近,上百辆共享单车,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公交站,站前的马路成了“露天停车场”。(7月16日《厦门日报》)

共享单车包围公交站、地铁站,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的情况,不只厦门有,在不少城市都已出现。尤其是一些大城市,网上的一些照片可谓触目惊心,有的公交站、地铁站外面的共享单车“盛况”让人叹为观止。这让不少市民对共享单车有意见,一些地方的城管等部门也与共享单车企业及单车用户发生了冲突。那么,共享单车“攻陷”公交车站,究竟是谁的问题?

毫无疑问,近一年来共享单车的发展速度太快了,有的企业在一些大城市投放了几十万辆。但是,共享单车“攻陷”公交车站,主要并非企业的单车投放量太大造成。因为企业并没将单车一律投放在车站,这些单车也是随着骑行而流动的。比如在上班早高峰,共享单车被大量骑到公交站、地铁站,下班后则被大量骑走。晚上去公交站、地铁站看看,共享单车很少。

当然,用户将共享单车骑到公交站、地铁站之后,不该随意停放影响交通。确实,现实中有些人素质不高,只顾个人便利,缺乏公共道德。然而不得不说的是,一些特殊时段,公交站、地铁站外被共享单车“攻陷”,不是单车使用者素质的事,而是因为单车停车位供应不足。这跟上下班高峰时街道上的汽车多会堵车,道理是完全一样的。过去没有那么多人骑单车去公交站,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公交站的停车位设置、停车管理没有相应应对,当然不行。

还有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情况是,现在无论是公交车站外还是街道上、社区里,都有大量的废弃自行车存在,这些自行车已经长期没人使用,却没得到及时清理,仍然占据着停车空间。其实,出现共享单车之后,出行的人未必有大量增加,但街头尤其是公交站等地的单车数量,共享单车作为增量不断出现,废弃自行车的存量却没减少,单车的停车位哪能够用?

市民每天去公交站、地铁站乘车上班是刚性需求,从家到车站、从车站到家的“最后一公里”需求,也必须得到有效的解决。过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公交部门开通了一些接驳公交,说实话效果并不很好。出现更灵活便利的共享单车之后,市民有了新的选择。从长期来看,共享单车增加了,个人购买自行车、乘坐社区接驳车和黑摩的都会减少,共享单车“成灾”只是短期内的现象而已。分析也说,现在共享单车的投放已经放缓。那么,面对新的形势,有关部门在公交路线与停车位调整、废弃自行车清理等方面,是不是该有所作为呢?

要让诺而不捐的伪慈善得不偿失

公民论坛

□史洪举

近日,在河北邯郸新建成的新愚公希望小学爱心拍卖会上,一家单位将写有20万元的现金支票模型送到校领导手中。可校长还没来得及平复激动的心情,就被事后拿到手的薄薄2000元浇了个透心凉。负责活动的演出公司则表示,20万元现金支票属于演出道具,不应该视为爱心捐款。

笔者认为,捐款者的这一做法,不仅丧失诚信、没有道德,而且违反相关法律,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20万元的捐款不算小数,能够让捐款者博得热衷公益慈善事业的美名,但需要拿出真金白银时,却只有区区2000元。这无疑是将捐款作为演戏,作为欺骗公众、戏耍受赠人的骗局。如果捐款单位存心有这样的行为,只能说明其毫无公德之心和诚信意识,既想利用大额捐款赢得美名,又不愿如实承担责任。其所作所为被曝光后,很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让人们看清其将捐款作为演戏的丑恶嘴脸。

而且,虽然捐赠者声称20万元的支票模型是演出道具,但并不妨碍其应如数兑现捐款的责任。根据合同法,普通赠与在赠与财产转移给受赠人之前,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但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不得撤销。即只要赠与人有赠与的意思表示,就应不打折扣地履行,否则受赠人可以通过诉讼等途径要求赠与人交付财产。根据慈善法,捐赠人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公开承诺捐赠但逾期不交付捐赠财产的,受赠人可以通过诉讼方式要求交付。

根据报道可知,捐款者是在当地的爱心拍卖会上将20万元的支票模型交到受助人手中的。这一支票模型虽然具有道具性质,但恰恰通过这一道具,参与爱心拍卖会的公众及受助人能够明白无误地看到捐款人将捐赠20万元。这相当于捐款人对公众和受助人公开做出捐款承诺,其事后必须如实履行捐款义务。

应该说,现实中只许诺空头捐赠支票却不兑现的伪慈善行为并不鲜见。这提醒一些慈善机构和公益活动组织方,一定要尽到审查义务,如要求捐赠者与受助人签订捐赠合同并进行公证,要求捐赠人兑现大部分承诺后方许可其在活动现场宣传事迹,给其提供“露脸”的机会,让沽名钓誉者没有市场。

具有公益慈善性质的捐赠是展现爱心的高尚事业,并关乎困难群体的尊严和发展,因此,这种捐赠容不得半点虚假、炒作和欺诈。相关部门既要曝光这种擅长演戏的伪慈善家,让其名声扫地、得不偿失,又要支持受助人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要求捐赠人履行承诺的义务。这样才能呵护本就脆弱的慈善事业健康发展,不被伪慈善行为搅浑水、拖后腿。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媒体视点

求贤村收“人头费”辱没“求贤”美名

求贤村,北京大兴区的一座古村,取这个村名的先人一定对后人抱有很大的期待,可是这个村最近却做了件很不得人心的事。该村以村规民约的名义下了一则通知,要求外来人口每人每月交2000元。

求贤村向流动人口收费的两个理由是治安管理和环境整治,光就这两点而言,其实都能理解,但是开支是面对所有居民的,不是只针对某个特殊的群体的,否则就有转嫁责任、雁过拔毛之嫌。

这笔费用的征收也应该在合理合法的范畴以内,不是村里一句村规民约就可以的。哪怕在城市居住小区也没有“人头费”的概念。不知其制定的标准是什么,哪个部门给批的?

求贤村的做法,反映了在地域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不能客观公正地对待外来人口的问题,妖魔化外来人口,甚至把他们当成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一些地方一方面离不开外来人口,另一方面又筑起门槛,搞歧视性条款,在同城待遇上设置过多的障碍,户口、居住、治安、教育等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对外地人歧视的做法。

外来人口,很多从事着本地居民不愿意做的一些事,他们是城市发展的功臣,而不是负担。流动人口的确增加了管理难度,但也带来了活力,对产生的问题需要用发展的眼光对待,不能只享受人口流入的红利而不承担责任。

没有外来人口的默默奉献,城市几乎寸步难行,没有外来人口,又怎么支撑得起北京如此高的房价和租金,身处北京周边的求贤村正是这种城市格局、社会分工的受益者,应该对这些从事大棚种植、给当地带来丰厚租金回报的外来人口心存感激。**(摘自《钱江晚报》,作者高路)**